

大革命时期宋庆龄同志路过南康纪实

黄学盛

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组的推动、协助下，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毅然改组了国民党，制订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，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。一九二六年（民国十五年）七月一日，广东国民政府发出了《北伐宣言》，七月九日，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。九月六日，国民革命军谭道源部攻克南康城。北伐军占领县城后，陈赞贤同志（中共地下党员）被委任为南康县县长。陈赞贤同志任县长后，遵照上级指示，协助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南康县党部，开展了农工革命运动，南康革命形势发展迅速。

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完成北伐、统一中国的宿愿，一九二六年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迁汉口。十一月底（农历是十月间），宋庆龄、鲍罗廷（苏联顾问）同志由孙科、宋子文陪同和广州国民政府部分成员一行数十人，经曲江（韶关）取道始兴、南

雄、大余，路过南康（当时韶关至汉口未通火车）。根据南康县城七位当时参加过欢迎集会老人的回忆，宋庆龄同志路过南康那天，天气晴朗，气候宜人。一大清早，县政府和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、店员代表、各界人士及县立考棚小学师生等数百人，列队到县城西外街西华庵一带（今西华供销社）等候迎接。大约到上午九时，宋庆龄等同志坐着绿色布轿由县城咸安门（西门）进城，先头是一小部分卫队，后面是数十辆轿队。轿有两人抬的，也有的是四人抬的；有人坐的，也有的是装物品的。当日下午一时许，在西街吴屋坪（今县委机关院内）举行了群众欢迎大会。大会会场由县商会用店板、木头搭起了临时主席台，台上用蓝布装饰一新。台中央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像，并贴有欢迎横联和彩式标语等。参加大会的有上千人。大会开始时，鸣爆、唱歌，当时唱的是一首“打倒列强！除军阀！”的流行革命歌曲。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宋庆龄、鲍罗廷、孙科、宋子文等六七人。大会由县长凌熙年主持。宋庆龄同志身穿大袖口素色旗袍，头梳发髻，气宇轩昂，仪表端庄，她首先在大会上讲话。讲话的内容大意是：现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，革命形势很好。号召群众要拥护国共合作，要感谢俄国帮助中国革命，要实行孙中山先生制

订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要开展反对压迫、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，要打倒军阀，打倒列强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；号召南康人民，加强农工团结，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北伐战争。宋庆龄同志的讲话不长，讲话结束后，群众热烈鼓掌，群情振奋，会场气氛活跃。她的讲话，大大鼓舞了南康人民的革命斗志，促进了南康农工运动的发展。接着，鲍罗廷、孙科也在会上讲了话（鲍讲俄语，有翻译）。开会时，会场周围没有站岗守卫的，群众可以自由进出会场，有些农村进城的农民也走进会场参加开会。会场上，人很多，但很安静。那时，由于国共合作的发展，北伐战争的胜利，南康县城各种行业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等组织都相继建立，社会秩序安宁，革命形势很好。

宋庆龄、鲍罗廷同志一行，在南康逗留了一天。短短的一天，她（他）们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。除出席群众欢迎集会外，还应邀出席了县政府、县商会举行的招待宴会。她（他）们还抽空游览了人群拥挤、热闹异常的南康小街，收集了部分贴在街头墙上盖有政府铃印的广告、布告等文件资料。这些布告文件有《赣南财政委员会布告》和刚刚组织起来的《南康县工会组织章程》等。她（他）们还找人谈话，了解当时国民党县党委部和各工会组织情况、农民运动

• • •

情况等。大约在当天下午四点钟，宋庆龄同志一行，又从南康西街富安巷出东门，离开南康城向赣州进发，前往武汉。

郭大力传略

赖荣福 朱心全

郭大力，原名郭秀 劼，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。父亲郭传科，清末郡庠生，虔南师范和南京两江优级师范毕业，曾任小学教员、校长、赣州甲种农校事务主任、赣州合作联社主任等职，近解放时，在家病死。郭传科前妻生有两子，长子就是郭大力。

郭大力同志，自幼聪明好学，甚为父母和家人宠爱。一九一二年秋，其父任南康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时，大力仅七岁就随父就读该校，经过七年学习（学制为七年），于一九一九年夏小学毕业，同年秋，考取江西省立第三中学。大力生活简朴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秀。一九二三年夏，郭大力在中学毕业后，即考入福建省陈嘉庚先生主办的厦门大学学习化学。郭的求知欲很强，经常手不释卷，废寝忘食地学习。一九二四年春，学校闹学潮，经过一番斗争，欧元怀等三位教授带领一批进步师生由福建转到上海，创办了大厦大学。郭大力为了追求真理，

随欧教授转入大厦大学学习哲学，于一九二七年夏毕业。

一九二七年，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。如果说在革命进入高潮时，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话，那么当革命转入低潮时，就更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每一个革命者的头脑。郭大力同志深知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，他还在大厦大学读书时，受到革命师生的影响，就想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。大革命的失败，对郭大力震动很大，他下定决心要翻译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把马克思这部伟大著作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。不幸的是，刚大学毕业的郭大力其时已患严重的伤寒病，不得不住入同济大学办的宝隆医院。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尽管头发脱了，但总算痊愈了。他为了更好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决心留在上海。出院不久，他就应聘在上海中学教英文。郭大力同志为人正直，业务水平高，教学工作细致认真，很受学生欢迎，但这样的好教师却为一些无为之辈所嫉妒，他在该校仅教了半年时间，就失聘了。一九二八年春，郭大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，便住在杭州大佛寺的一间小客房里，专心学习和翻译《资本论》。那时，王亚南因大革命失败，离开了国民党。

部队，也住在大佛寺。他俩相识不久，便情投意合，决定共同翻译《资本论》。郭大力在翻译《资本论》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，感到自己对古典经济学的素养太差，回到上海。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，郭大力应上海光夏中学之聘在该校教英文，同时从头自修德文和钻研古典经济学著作。郭在光夏中学任教期间，被正在该校读书的余信芬（又名余兰英）看中，她爱慕郭大力为人正直和才华出众，以后结了婚。郭大力在光夏中学教学一年，余信芬也中学毕业了，并考取暨南大学教育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郭在暨南大学附近的真茹火车站旁边租了一间房子居住。在那里尽管生活较苦，工作、学习条件差，但他以惊人的毅力，日以继夜地工作、学习和翻译。这段时间翻译的主要著作有里嘉图的《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》，亚当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、伊利的《经济学大纲》、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、穆勒的《经济学原理》、洛贝尔图的《生产过剩与恐慌》、朗格的《唯物论史》等等。郭无论是写文章，还是翻译都非常认真。在翻译上他从不满足一种版本，他看了英文的，又看日文的，更看德文的。他写的稿子总是写好又改，改了再写，确实下了苦功。通过这番艰苦磨炼，为他以后翻译《资本论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一九三七年，上海读书生

活出版社决定出版《资本论》。在这个时期，郭大力一方面要翻译《资本论》，另一方面又要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沉重负担。因为那时他们已生育一男一女，爱人又要上大学，这一切的费用都要靠他的稿费来维持，有时经费实在支配不过来，郭便不得已到暨南大学去代课，以增加点经济收入来维持生活。

一九三七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后，日寇在上海胡作非为，郭大力在上海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，在这种情况下他回到了家乡。回家不久，又接到出版《资本论》的通知，他旋即带着翻译好的手稿，冒着风险到达日寇占领的上海。在那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校阅，一百八十万字的《资本论》三卷中文全译本，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八、九月间出版了。郭大力在上海校阅定稿后，又起程回家，途经香港、广东，当他到达南雄县境时便遭到以钟秀山为首的地主武装的绑架。那伙土匪以为他是富商，把他抓上山寨搜查审问，郭则对他们进行“枪口对外，团结抗日的教育，经过二十多天的较量才被放回。回家后，郭大力夫妇应周蔚生校长聘请，到江西省立赣县中学任教。郭大力还把被土匪绑架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匪窟记》刊在省赣中校刊上。

郭大力同志在省赣中任教期间，夫妻同住在学

校附近的一间陋室中，尽管条件差，总还算安全，对学习和翻译有利。一九三九年因日寇入侵，学校搬迁到赣县王母渡，郭任高中的英文课，爱人余信芬任初中的课，天天要去相距五六华里远的横圩上课，实在太不方便，严重地影响了郭的翻译工作。一九四〇年夏，广东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聘请郭前往该院讲授政治经济学，郭带领全家前往广东连县。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，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高压政策，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，郭被迫辞职，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返回江西。适逢省赣女师迁至离他家不远的南康凤岗圩，余信芬受女师校长谭达之聘请在女师任教一年，而郭大力则在家埋头翻译《剩余价值学说史》。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七年在乡下居住期间，郭大力除了跟王亚南等少数人保持通信联系和每逢二、五、八日赴凤岗圩到钟三兴店里拿报纸外，极少与别人来往，闭门谢客，终日学习和翻译，休息时就打扫庭院和到菜圃内种菜。

郭大力同志一向生活朴素，为人忠诚老实。他很欣尝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精神，在家里他勤劳朴实，在人民面前，他谦虚谨慎，平易近人，从不摆什么架子。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，有些地方绅士就想把设在斜角

里的一仓库稻谷中饱私囊。郭大力知道这个情况，便与群众一道对绅士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把这些稻谷分给了穷苦百姓。绅士们向伪政府告发，到斜角来抓人，郭大力便挺身而出，大胆承担责任，受到群众的赞许。

抗战胜利后，王亚南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。郭大力同志不仅熟悉古典经济学，对当代经济学也颇有研究。因懂经济学的人太少，王亚南非要郭大力去不可。于是一九四七年春，郭便去厦门大学任经济学教授。在那里，他不仅认真教学和研究，对国内外大事也非常关心，很受师生的尊重。一九四九年春，我们党就把郭大力、王亚南等进步教授途径香港接到刚刚解放的北京。一九五〇年夏，郭大力同志被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，任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。他在中央党校除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外，还完成了《资本论》和《剩余价值学说史》的译文修改工作。他的主要著作：《关于马克思的〈资本论〉》、《西洋经济思想》、《凯恩斯批判》、《〈帝国主义论〉讲解》、《生产建设论》等，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他不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，他加倍努力工作，用实际行动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。

务。郭大力同志曾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全国政协二、三、四届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。可是，在是非颠倒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被戴上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而被批斗，尽管他身患高血压病也被下放到河南农村。以后郭大力同志虽然回到了北京，但因其身体受了严重折磨，病情恶化，不幸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因心肌梗塞，医治无效而离开了人间。他的逝世，是我党政治、经济理论战线上的一大损失。

抗战时期“东南工合”在南康的活动

刘尧桢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为了动员后方的人力与物力，发展工业生产，增强抗战经济力量，坚持长期抗战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，由国际友人路易·艾黎·埃德加·斯诺和胡愈之、陈翰生等发起，组织“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设计委员会”，推举艾黎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。一九三八年六月，艾黎到武汉着手筹组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（简称“工合”）。这个协会曾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及支持，宋庆龄同志曾任“工合”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。

为了推进工业合作运动，艾黎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来到赣州，筹组了东南工合办事处，由艾黎兼第一任主任。“东南工合”办事处成立后，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赣州市委机关曾秘密设立那里。一九四〇年夏，还成立了中共“东南工合”工委，成为我党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。

艾黎根据“工合”关于“设立十万所工业合作

社，可以解决数百万难民生活，可以增加抗战经济力量”的精神，在赣南选择赣县、于都、兴国、瑞金、会昌、南康、上犹、大余、龙南等县设立了“工合”事务所或指导站。同时，我党先后临时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于都、兴国、会昌、南康等县参加“工合”工作。

一九三九年春，“东南工合”办事处在我县设立了“工合”指导站。不久指导站撤销，由“工合”赣县事务所先后派“工合”指导员黄正言、邢其玖来我县唐江等地，开展了工业合作运动。其主要情况是：

一、积极开展了组社工作

“工合”指导员根据组社的目的和原则，在我县唐江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。从立足当地资源和市场需要出发，鉴于唐江当时有“天下第一圩”之称，市场比较大，手工业较发达，集市贸易较繁荣。它不仅有崇义、上犹林区运销流向的木材资源，又有附近广大农村家庭织布的手工业，而且距赣州和崇义、上犹山区一带较近，当地生产的各种产品就有较广阔的销费市场。特别是竹马、龙华等地盛产的甘蔗及生产的土糖，是赣南和南昌等地市场糖业的主要货源。因此，因地制宜地发展手工业生

产，可以解决一部分失业工人和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的生活困难，繁荣市场，支援抗日战争。经过宣传“工合”的性质、意义、任务及组织起来，生产自救的重要性，按照应吸收失业劳苦工农，有劳动技能的人参加，及要七人以上方能组成合作社的办社规定，积极开展了组社工作。先后在我县唐江办起了印染、制线、制袜、纺织、木器等生产合作社，在竹马、龙华组织了蔗糖生产合作社，入社的社员共有二百人左右。这七个生产合作社开办后，门上都贴有“工合”的会徽，门的两侧写有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标语，生产的产品盖有“工合”的标记。这样就不断地扩大了“工合”的影响，使我县唐江等地的“工合”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。

二、发动社员搞好民主管理

我县唐江等地组建的工业生产合作社，直接归“工合”赣县事务所领导。在“工合”指导员的具體指导下，各社制定了“工合”的章程，并发动社员搞好民主管理。按照社章规定，社员大会是社内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各社都召开了社员大会，选举产生了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。制线社的理事长是罗必祈，制袜社的理事长陈学良，蔗糖社的理事长钟名鸿。印染社从开办起共选举了三届理事会和监事

会，理事长第一届是卢同镐，第二届是肖义泽，第三届是肖其玖。除选有理事长和监事长外，还设有会计、司库。他们分工负责管理社内生产等活动。在整个社内活动中，他们要接受社员的监督，每年年终要向社员报告生产情况，公布财务。社员也以主人翁的态度，积极参加生产，管理生产。

三、解决资金来源和实行按劳分配

为了进行生产，各社根据生产需要，解决了生产资金的问题。其资金来源：一是少量的股金。印染社社员入股每股股金为四百元（伪钞票），蔗糖社的入社股金是一至二个银元。二是主要靠“协会”拨款和向银行贷款。印染社一开办，协会就拨给了生产资金，该社根据生产和扩大经营业务的需要，还向银行贷款五万元。制线社每当进入生丝生产季节时，就要向银行贷款，购进全年制线生产的足够原材料。在春荒不接缺粮、缺肥时，蔗糖社就用银行贷款，及早从赣州购进大米和麸饼，发放给入社的蔗农，支持甘蔗生产的发展。同时“工合”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。工资形式有计件，死分活值，计时三种，取消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不合理现象。据原“工合”社员回忆，制线社每月工资发一担米，印染社每月工资为六至十个银元。各社根据

经济效益的情况，年终还从盈利中提留10%的公积金和10%的公益金；有的提留5%酬劳金分给理、监事；再从盈利中提取60—70%的生产成果，作为劳动分配或社员股金分红。为了搞好社内的福利事业，对有生活困难的社员，从福利金中及时进行补助。印染社还养了猪，社员每年可分得猪肉三、四十斤，使社员生活不断得到改善。

四、组建“工合”所起的作用

第一、解决了部分失业工人的生活出路。

作为生产自救的工业合作运动在我县唐江等地开展后，“工合”为就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，解决了部分失业工人的生活出路。例如：当时唐江的印染工人卢同镐、卢和瑞、曾昭兰、曾桂林等，从曾源盛私人染坊倒闭出来后，在谋业无门，生活无着落的困境下，他们听了“工合”的宣传，如鱼得水，很快就办起了印染生产合作社。不仅使他们的技术专长得到了发挥，而且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保障。原制线社刘茂节深有体会地说：“那时我们入了制线社，社内七个工人，不愁无工做，只愁做不赢。

第二、为社会提供了需要。

各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技术力量，根据市场

的需要，不断发展了生产，使“工合”产品充满各地市场，呈现了一派战时经济的新景象。那时，各色丝线，市场比较紧缺，销路甚广，制线社就努力增加生产，产品远销赣南和广东兴宁等地。印染社除搞好印染生产之外，还开展了自营业务，印染出售的土布很受上犹、崇义山区农民的喜爱。蔗糖社生产的土糖成为赣州、南昌等地的行销货。由于各社生产的产品，注重质量，产销对路，不断地为社会提供了需要。

第三、对社员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。

“工合”指导员邢其玖，加强了对各社工作的指导。他吃住在木器社，经常深入各社检查生产，召开社员会，传达上级精神，向社员宣传抵制日货，组织起来，发展工业生产，支援前方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。同时，他以身作则，作风正派，教育社员严格遵守纪律，禁止嫖赌，并组织社员对国民党反动派乱抓“工合”社员当壮丁的行动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总之，“东南工合”在我县虽然办社的时间只有四、五年，但它对抗战，对地方工业的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正如斯诺对“工合”的评语所说：“工合给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工作和教育。”它在我县的活动和作用必将载入我县史册。